

# 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中国民主的新形态与新贡献

唐亚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时代中国民主的新进展与新创造，拓展了中国民主的实践场域与理论形态，既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鲜明标识，又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国家形态、民主形态与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努力争取民主，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作为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努力实现民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内化于制度运行过程中。

在我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上，而且体现在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上，体现在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从而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化为生动的民主参与实践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发展绩效。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大论断，指出“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创造性地对人民民主在新时代

的实践进行了高度理论概括。之后，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在2021年10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要求，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与推进方式等进行了系统阐述。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行系统论述和整体部署，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资产阶级民主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概念，也建立了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主要求的代议制度，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而且推动资产阶级民主运转的多党竞争制度又让资本集团、利益集团、政党集团等主宰了制定和执行国家公共政策的实际进程，保证资本集团、利益集团、政党集团成为绑架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以实现自己私利的统治力量，导致资产阶级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蜕变为金钱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系统总结中国民主的实践经验，充分汲取人类社会民主形态的有益创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时代又根据中国民主的新进展与新经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在新时代的新进展与新创造，让人民当家作主有了体系化的制度保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过程人民民主又解决了民主的实践运作问题，将人民当家作主转

化为生动的民主参与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民主发展绩效，为建构人类民主政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经验与新路径，提升了现代民主的运作质量与成效，实现了民主理论的重大创新、民主实践的重大进展与民主发展绩效的重大提升。

##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

民主有价值、制度、实践与道路等内在理论层次。民主价值体现为人民主权原则，表现为人民通过当家作主实现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民主制度是为解决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事务而建构的制约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分配公共利益、提升公共精神的规则体系。民主实践是让人民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并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展现共同体成员间平等协商、团结友爱的民主文化。民主道路即一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奉行什么样的民主理念，建构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体系，产生什么样的民主发展模式，是由该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自主选择，并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资产阶级民主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代议制度、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多党竞争制度、自由选举制度等而形成的。这种建立在人性恶与公权力恶“双重恶”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民主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并将政府作用局限于有限的施政范围内，难有作为；二是不重视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政党建设，让政党始终致力于成为部分群体利益与资本集团利益的代表，成为绑架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狭隘力量；三是将民主简化为周期性的竞争性选举，让人民每几年行使一次投票权，忽视人民经常性、长期性民主参与实践；四是将自己上升为普遍理念和普遍模式，强行在世界范围内推

广，忽视民主的多样性、实践性和实效性

等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强调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还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有效推动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过程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实践环节，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充分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人民当家作主全面、真实、完整地落到各处。我们要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各项工作中来。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首先从理念层面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民主的价值、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实践、民主的绩效四者有机统一起来，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又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从制度体系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内在构成。这是一个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在内的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

再次，从实践绩效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追求，关注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百姓日常琐事，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保障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创建了多样化的民主参与平台、载体与机制，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

与，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巩固和发展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最后，从运作形态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指引我们创造了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真实民主形态，是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包括国家民主又包括社会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又包括经济民主，既包括全国范围的民主又包括地方基层的民主，既包括选举民主又包括协商民主，是一个多样化民主的复合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特征与实践绩效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的生命力来自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特征及其实践绩效。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过程中，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根据本国国情、人民的意志和现代化的要求，创造出的现代民主实践运作新形态，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坚持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狭隘的价值观、利益观与参与观。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

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表现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表现在让人民发挥主人翁精神、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管理；表现在人民在民主实践活动全过程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参与感、满足感和尊严感。能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检验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质量与效果的“试金石”。

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取得实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任务。无论是民主权利的表述与行使，还是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协商与处置，都是与人民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紧密相关的，都需要人民通过多样化平台、渠道和方式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整体合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要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直面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增强各项改革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更好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坚持系统观念。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多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能搞单兵突进，要坚持系统观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将物质文明的富裕、制度文明的优良和精神文明的富有有机统一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转自《人民日报》）

# “见事见人”才能“见效”

杨旗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关系人民群众能否感受党和政府温暖的“神经末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下，各地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习近平总书记赴宁夏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联系实际细化实化抓手，坚持久久为功。要明确责任、到底到边、见事见人地抓好基层治理。”“见事见人”体现我国基层治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加强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评价基层治理效果的重要标准。

所谓“见事”，就是基层治理须以“事”为抓手，谋全局，抓具体。一方面，要因因地制宜，将宏观政策转化落地为具体行动方案；另一方面，要立足实际需求，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能“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台账摆成山，问题埋地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省情民情和发展阶段特征部署实施“千万工程”，紧紧抓住生态这个农村最大优势，紧盯农村环境脏、乱、差突出问题，着力探索整体解决方案。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自身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条件、文化风俗等制定方案，推动建成万千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宜居乡村。可见，在基层治理中，以“事”细化抓手，精准识别治理靶点，科学设计“施工图”，尽力而为，真抓实干，才能把“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群众事情无小事。“见事”也意味着

要管好“小事”。“小事”是群众的“心头事”，不能“小视”，而要当“大事”来抓。真正以“小”成“大”、“小”中见“大”，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深入把握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治理关键在人。所谓“见人”，主要涉及主责、主题、主角等方面。具体来看，各级党政主要负责负责人要切实承担领导责任，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到责任到底到边、事事有人负责。例如，北京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建立起市委统一领导，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各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和各部门各单位闻风而动、接诉即办的为民服务体系，各级党员干部躬身实干、奉献为民，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见人”的重点在于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民生无小事，涉及点多面广，面广，党员干部只有经常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急难愁盼，“施工”才能有的放矢，“脚底不沾泥，心中没主意”是万万要不得的。此外，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其内生动力。基层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见事见人地抓好基层治理，贵在久久为功。基层治理要见到实效，绝非“一日之功”。习近平总书强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20多年来，浙江通过持之以恒实施“八八战略”，成功破解了“成长的烦恼”；山西右玉，20多任县委书记带领干部群众一任接着一任种树，昔日“不毛之地”如今成为“塞上绿洲”。实践证明，保持战略定力，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干，基层治理才能真正做好、做扎实。同时，要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为长效治理提供坚实保障。例如，上海接续实施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出台《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以制度保障压茬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

基层治理是一项“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系统工程，需要下足一番“绣花功夫”。既需“致广大”的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注重系统集成；又需“尽精微”的匠心，在“见事见人”中彰显精度、力度与温度。唯有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始终葆有到底到边、责任担当和实干作为，方能绘好基层治理的“施工图”、建好“施工队”、共创“实景图”，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注入活力。（转自《人民日报》）

##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体现

# 深刻认识我国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

王凯 李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洋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有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悠久传统，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积淀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并不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洋文化史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认识更加深刻，海洋文化也成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也有利于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精神动力、提供文化支撑。

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从未中断、延续至今，形成了向海而生的海洋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渔盐之利”就成为齐国等诸侯国的富国之本。秦汉时期，捕鱼工具更加先进，船舶设备逐步完善，耕海牧渔已成为中国人生产生活中重要方式。此后，海洋经济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重要对外贸易渠道。瓷器、茶叶等中华物产通过海路流向各国，逐渐成为中国外销的大宗商品。沿海贸易港、实现通商的国家地区的数量也相应有所变化，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向海上转移。海洋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重要资源，向海而生的海洋文化是我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证。

激发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耕海牧渔的生产生活、连通世界的贸

易往来，不仅让中国古人留下许多依海而立的历史踪迹，而且推动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贸易制度等领域不断创新。比如，在造船技术上，古代中国就有“榫合钉接”这样领先世界的发明，能够提高船体的抗风浪强度和船体构件间的稳固度，大大提升船舶的远航能力。远洋航海除了借助罗盘，还配合使用过洋牵星术，即通过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航行方向和所处纬度，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程度。历代封建王朝均注重管理海外贸易，创造了以市舶司制度为代表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体系。市舶司负责管理进出港口船舶及其货物，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还鼓励外商来华贸易，代表政府迎送往来外国使者，展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制度文明。依海而立的海洋文化不断激发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

增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海外贸易的繁荣为不同民族人口迁徙聚居、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唐宋以降，海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泉州、广州等繁荣的海港城市。这些海港城市“蕃舶凑集”“宝货丛聚”，能够为人们提供丰厚优越的生活条件，吸引了不同民族、讲着南腔北调的人们移居。他们凭海而聚，在海洋经济的各个环节扎下自己生存的根基，逐渐形成了相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气韵，对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重要促进作用。比如，妈祖文化就是我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纽带。凭海而聚的海洋文化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其中的一个鲜明表现就是形成了各种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海洋是中华文明蓬勃兴盛的重要基础。以海为媒，中华文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以开放包容为底色的海洋文化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海外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同东南亚、西亚乃至北非地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空前拓展。以外商云集的海港城市为起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异域文化也传播到中国，既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元素，自身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海而兴的文明发展历程塑造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基因。

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究和实生物，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其所承载的“和”文化至今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和平也是开展海外贸易，从而通商之便、致天下之利的重要前提。“和”文化早已深深融入我国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之中。比如，和气生财历来都是中国人通商贸易的商业准则。又如，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不是为了像西方国家那样侵略殖民，也没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是为了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播撒下和平与友谊的种子，促进中外贸易融通和文化交流。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民族倚海而通的历史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转自《人民日报》）